

#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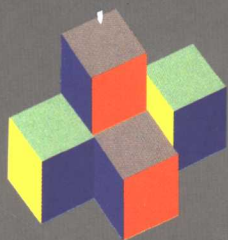
#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遏制战略：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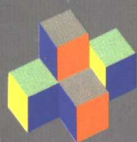
[美] 约翰·加迪斯 著

时殷弘 李庆四 樊吉社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加迪斯是近20多年来最重要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之一，也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史家乃至战略思想家。他精微和富有创见地贯彻了他与战略史同行保罗·肯尼迪的一项共同见识，即“只有历史研究才产生对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如何运用以及战略家在具体的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正确理解”。1982年，他出版本书，成功地揭示和展现了多项在他看来“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思维方式”。本书无愧是一部具有经典水平的战略史杰作，并且做出了重要的大战略理论建树，一出版即成为名著。

本书连贯和统一地考察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末年到吉米·卡特为止十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发现和解释了其内在演变脉络，揭示了其中的战略机理，同时从大战略角度评介其理念、纲领、实施和成败得失。由于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档案文件解密和公布制度，关于这个主题可供使用的档案史料异常丰富和详密，从而使他能够比考察其他主题的战略史同行做得更加精细准确。他将充分利用大量原始史料的微观研究与恢宏潇洒的宏观思考结合起来，同时凭借卓越的机理洞察力和概念塑造才华，精彩地揭示了寓于遏制战略史中的许多精微复杂的战略机理。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任何其他著名的大战略阐释者。

ISBN 7-5012-2508-7



9 787501 225088 >

ISBN 7-5012-2508-7/D · 515

定价：39.00 元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遏制战略：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美] 约翰·加迪斯 著  
时殷弘 李庆四 樊吉社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pyright © 1982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中文简体字版©2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is translation of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2,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 (美) 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著；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3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书名原文：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SBN 7-5012-2508-7

I. 遏... II. ①加... ②时... ③李... ④樊... III. 国家安全—研究—美国 IV. D7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7434 号

图字：01—2001—5180

书 名 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责任校对 戴文达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1/16 24½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 专家委员会

袁 明 时殷弘 秦亚青  
王缉思 阎学通 倪世雄

## 编辑委员会

姚东桥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勇 王 联 于铁军 张小明  
潘成鑫 袁路明 周宇君 夏力宁

## 本书译者

时殷弘 李庆四 樊吉社

献给美国海军学院战略讲习班（1975年~1977年）同僚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上校温德尔·P.C. 摩根撒勒  
和  
美国海军上校阿伦·T. 艾萨克森

#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

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20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问题在内。这一本源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



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 1991 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論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

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确实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 明

2002年10月

# 前言

有人提出，历史学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聚合者”，另一类是“分割者”。<sup>1</sup>“聚合者”追求将秩序加诸于往昔；他们试图揭示出表达整个时期的含义的广泛概论；他们追求使复杂的事态系统化，用一种有序的模式避开历史的混乱无序，恰好适合书里面各章对称的框架，通常被塞给不抱怀疑的大学本科。相反，“分割者”大多是为了他们彼此——还有他们的没有防备的研究生——写作。他们喜欢指出例外、保留、不调和之处和矛盾；一句话，他们将模棱两可升华为一种高深的历史编纂艺术。对于写历史，这两种方式都需要，甚至都必不可少，然而就同一个论题而言，它们并非总是在同时以同等的分量出现。在“聚合者”和“分割者”之间确立平衡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某些人还不准备将其当做历史的一个领域来说尤其如此，这个领域便是美国置身于冷战的经历。起初的说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写成）倾向于细节，即关于所发生事态的、篇幅漫长但不大有分析的叙述，通常依据回忆性史料和已发表的资料，有时也依据内部信息。浏览这些说明的人一开始很着迷，但接着很快就被过多的细节搞腻烦了，因为“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伴随那作为修正派学说而为人所知的“聚合”的勃发，有一种解答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来临：它宏观，具有分析性，其发现不时令人吃惊，但有时也让人想起一个表演空中飞人的杂技家，从一个结论跳到另一个结论而无明显的证据支持。不可避免地来了逆反：“分割者”出现了，他们一点点啃掉修正派学说的基础，直至它的许多（虽然不是所有）极动人的上层建筑开始倒塌。没有出现任何在宽广程度上可与之相比的综合来取代它的位置。近年的冷战研究已见到了大批

依据大量新史料的细致的专著，然而并无任何总的图案从中浮现出来。这是不幸的，因为如同专注于细节一样重要，不时回顾更大的图画有一定价值，即使它的某些局部颇为难看地突出到了画框之外。

本书是一项重新调整对比、以利于“聚合”的努力。它试图根据新的证据和晚近的研究，重新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整个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它不是从比较传统的外交、经济、意识形态或军事观点出发来探究其课题，而是从我认为包容了所有这一切的一个视角出发，那就是战略视角。我用“战略”一词，是颇为简单地指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联系起来的一个过程。每个决策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然而政策的学术研究者着迷于区域性、专题性或官僚机构研究方法的同时，对它的注意少得出奇。我愿将这种“战略的”观点应用于在我看来一直是战后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关注——遏制\*观念，为的是解释这一观念的前后相继的种种变异、表现和转换，那是它多年里经历过的。

我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方法受到亚历山大·乔治的著作影响，他做了许多工作来破除将当代史与政治科学这两个领域隔开的表面的方法论障碍。乔治提出，对政治领导人来说，存在着某种他称为“操作编码”（“operational code”）的东西，即一套关于世界的前提性假定，那是在一个人事业生涯的早先时候形成的，倾向于支配一个人后来对危机的反应方式而无多大变动。<sup>2</sup>在这一论辩的基础上再作引申，我将提出：对于总统的行政当局来说，有着一定的“战略”或“地缘政治”编码，那就是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对这些利益的潜在威胁和可行的反应的前提性假定，它们在一个行政当局上台前或上台后不久趋于形成，而且除了出现非常不同寻常的境况，此后倾向于没有多大改变。亨利·基辛格写道：“认为领导人在取得经验的同时会变得更深刻，是个幻想……领导人在升到高层官位以前就已形成的信念是其知识资本，只要他们还继续坐在官位上，他们就会滥用之。”<sup>3</sup>

---

\* “遏制”这个术语引起某些问题，因为它确实蕴涵着一个意思，即美国的政策方向始终是防御性的。一个人可以就1945年以来华盛顿对世界的方针是不是防御性的做详细的争辩（我倾向于认为是），但这争辩对于本书的目的来说不相干。在此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始终设想自己是在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做出反应，而非对其发动挑战。由于这个原因，将遏制观念当做战后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主题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我将论证在战后时代，有过五种显著不同的地缘政治编码：1947~1949年间表达的、乔治·凯南的最初的遏制战略，据我认为由杜鲁门行政当局在那一时期予以大致的贯彻；围绕国安会（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的各项前提性假设，它们在1950~1953年间作为朝鲜战争的一项结果被付诸实施；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新面貌”战略，它从1953年延续到1961年；肯尼迪—约翰逊“灵活反应战略”，它直到约翰逊1969年去职为止，规定了美国对世界的立场方针；我们现在怀旧似地把它同“缓和”一词连接起来的一套思想体系，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并且实际上既由福特、也由卡特继续下去，直到1979年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止。再次从亚历山大·乔治那里借用概念，我打算在此着手对这些地缘政治编码、这些前后相继的遏制方法做一番适度的“结构性集中比较”（“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sup>4</sup>看看什么样的图案可能从中浮现出来。我做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在于抛出一个大的、但我希望不是过分难消化的“聚合”物，它至少应当给近来膳食不足的“分割者”某种咀嚼的东西。

说一下本书的结构是适宜的。第一章和第十一章以笼统的方式，谈论遏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前身和它的当今地位。第二章到第十章更严密地讨论上面勾勒的各种遏制方法。我的程序大致是在一章里论述一种方法，<sup>\*</sup>在接下来一章里评价其贯彻。然而，对于这一模式有两项例外。因为国安会68号文件构成国家战略基础的时期相对短暂，论述它的第四章既涵盖内容，也涵盖贯彻。关于“灵活反应”之贯彻的第八章，则采取了一种关于越南战争的详细的实例研究的形式。

本书是我在美国海军学院两年讲授的一个直接发展，而这个学院据我认为是在关注历史同政策的关系方面独特的机构。我感谢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和朱利恩·J. 勒布尔·热瓦两位海军上将以及菲利普·A. 克·劳尔，他们使这一经历成为可能；我也感谢先前的同事，特别是詹姆斯·E. 金、托马斯·H. 埃泽尔、戴维·舍恩鲍姆和内德·莱博，本书包含的

---

\* 依据乔治主张有系统的比较的呼吁，我（希望不至于过分令人生厌）就每一种战略都问以下几个问题：（1）有关的行政当局就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持怎样的观念？（2）它如何设想对这些利益的威胁？（3）按照这些利益和威胁，它选择做什么反应？（4）它如何力求证明这些反应是正当的？

思想经过了同他们的许多讨论；感谢大量学生，他们那彬彬有礼但健康的怀疑是一种宝贵的矫正物；我还感谢两位令人愉快的教师同伴和办公室同僚，对他们的耐心和容忍已在献辞页上表示了敬意。

俄亥俄大学的学生和同事也已对本书所闻甚多，多于他们本来想得到的。我感谢他们的评论，特别是查尔斯·C. 亚历山大、阿隆佐·L. 汉比和戴维·L. 威廉斯。卡伦·威廉斯在本职工作要求以外，对一项难以理解的脚注追查到底，多里斯·多尔则以在阿森斯\*的历史学教授们已开始赞赏的效率，将手稿打字为印刷体。

乔治·F. 凯南和 W.W. 罗斯托抽出时间，仔细地阅读了手稿中论说他们在华盛顿的岁月的部分，并且回答了有关问题。我感谢他们在考虑我的论点（对这些论点我怀疑他们并非总是同意）时的耐心。罗伯特·A. 迪万搁下他自己关于艾森豪威尔的研究，就第五章和第六章给了我恰到好处的建议。还有，在准备本书出版时，同谢尔顿·迈耶、维多利亚·比姬尔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令人愉快。

我有幸在格外多样的不同场所被给予讲坛，借以形成和发展某些在此面世的思想。我愿感谢 Sadao Asada 和 Nobunao Matsuyama 两位教授，因为他们安排我参加 1978 年在京都的美国研究夏季讲习班，在那里本书的轮廓被最初勾勒出来；感谢小塞缪尔·F. 韦尔斯，因为他组织了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的几次富有成果的讨论会，那是关于历史同政策的关系和国安会 68 号文件的；感谢杰拉尔德·J. 伯纳特博士与其夫人，他们使得对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所做的 1980 年斯图尔特·L. 伯纳特纪念演讲成为可能；感谢阿瑟·丰克教授，他组织了 1980 年在伦敦举行的英国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委员会联席会议；最后，还感谢我在赫尔辛基大学历史和文件研究所的“大”、“小”两个“俱乐部”中的同僚。

本书大量依据档案史料，其中许多是近来被公开的。我感谢几个总统图书馆（哈里·S. 杜鲁门、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约翰·F. 肯尼迪和林登·B. 约翰逊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外交和现代军事两个分馆的工作人员给予我的必不可少的帮助；也感谢乔治·F. 凯南，因为他允许我使用他的私人文件并从中援引，并且感谢这些文件所藏之处——普林斯

\* 俄亥俄州阿森斯市，俄亥俄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顿大学西利·马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来自海军学院高级研究中心和全国人文学基金会的资金赠予帮助支持了本书的写作，我对此谨表谢意。本书的一些短篇组成部分已经以略为不同的形式，见于《外交》季刊、《国际安全》季刊和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通讯》，它们经过允许而在此出现。

最后表述对家人的感激之情，但很难说是最次要的。迈克尔和戴维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克制，不去（至少不经常去）搞乱他们的爸爸的大堆纸张、笔记卡片、文件夹和录音磁带。我妻子芭芭拉（她不喜欢很情感化的谢意）以同情的倾听和批评性的思考帮助我克服一些难点，但她大多宁愿研究冰河和泥炭沼泽，或者聆听威莉·纳尔逊。

J.L. 加迪斯

1981年1月于芬兰赫尔辛基

#### 注 释：

- 1 J.H. Hexter, *On Historians* (Cambridge, Mass.: 1979), pp. 241 - 243.
- 2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ecision -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XII (June 1969), 190 - 222.
- 3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 p. 54.
- 4 Alexander George,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The Method of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in Paul Gordon Lauren, ed., *Diplomacy: 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olicy* (New York: 1979), pp. 43 - 68.

# 目 录

- 第一章 序言：凯南以前的遏制 / 1
- 第二章 乔治·凯南与遏制政策 / 25
- 第三章 实施遏制 / 56
- 第四章 国家安委会 68 号文件与朝鲜战争 / 95
- 第五章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新面貌”战略 / 135
- 第六章 实施“新面貌”战略 / 175
- 第七章 肯尼迪、约翰逊与“灵活反应”战略 / 212
- 第八章 实施“灵活反应”战略：在越南的检验 / 252
- 第九章 尼克松、基辛格与缓和战略 / 291
- 第十章 实施缓和战略 / 326
- 结 语 基辛格之后的遏制 / 362
- 附 录 / 374



## 第一章

## 序言：凯南以前的遏制

“我的孩子，在严重危难时候你同魔鬼携手同行是可以的，直到你过了难关为止”。这是一个巴尔干古老谚语（它甚至得到东正教会首肯）的罗斯福版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喜欢屡屡援引之，以便解释为什么使用可疑的盟友来达到无疑的目标。<sup>1</sup>他相信，在全面战争中，最终目的——胜利——使得对于手段的一定宽纵成为正当的，而这在任何场合都莫过于依靠斯大林的苏联来帮助打败德国和日本。在1941年夏天，任何种类的盟友在伦敦和华盛顿都足够受欢迎；然而，苏联突然以这种角色出现一事，仍无法避免在这两个首都引起浮士德式的沉思。众所周知，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丘吉尔愿意在英国国会为魔鬼说些有分寸的赞语；\*人们不那么熟悉的，是罗斯福就他的谚语对一位老朋友约瑟夫·戴维斯的解说：“我不能采纳共产主义，你也不能，但为了过这个难关，我将同魔鬼携手来。”<sup>2</sup>

按照随后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个意象是恰当的。同苏联的合作帮助美国和英国取得了对其敌人的胜利，而且是在一段显然短暂的时间内、以少得令人惊异（就所涉及的作战范围而言）的伤亡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代价是兴起了一个甚至更为强大而且更难看透的极权主义国家，并且作为一个后果，出现了一种显然是经久的、脆弱不稳的不确定状态，它现在已超过导致它的那个短暂和不自在的联盟好多倍时间。

“遏制”这一术语一般被用来表示战后时代美国对苏政策的特征，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系列努力，以对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浮士德式交易的后果。

\* “倘若希特勒入侵地狱，我将在下院至少用句好话来提到魔鬼。”(Winston S.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Boston: 1950, pp. 370 - 371.)